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一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一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第一分册)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181,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7,000

书号 11001·464 定价 0.75元

(限国内发行)

说 明

《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的编写工作始于一九六一年。当时由我室和我校部分学员共同写成初稿，并在内部印发征求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初稿的修改工作一直未能继续下去。从一九七九年，为适应我校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中共党史专业的教学需要，我们把原稿作了改写，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到一九五六年的历史，准备分为四个分册陆续出版。第一分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党在北伐战争时期”，第二分册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分册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第四分册为“党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历史，有待今后继续编写。

本书由李践为同志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主要有以下同志：

第一分册：王渔，周养儒，陈登才。

第二分册：刘经宇，王荣先。

第三分册：肖一平，何明，王秀鑫，潘世超，翁仲二。

第四分册：张弓，林邦光。

我室其他同志也为本书的编写做了许多工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一些老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廖盖隆同志对本书内容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第 一 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 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1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4
第三节	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24
第四节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党的第一次代表 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8
第二章	党的早期革命活动	51
第一节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国际国内形势	51
第二节	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	59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73
第四节	农民运动的兴起。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积极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	81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小结	93

第二编

党在北伐战争时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95
第一节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国际国内形势	95
第二节	国共合作的实现。工农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02
第三节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16
第四章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129
第一节	党的十月会议。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129
第二节	反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35
第三节	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陈独秀的妥协退让。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	150
第五章	北伐战争和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	157
第一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洋军阀的大溃败	157
第二节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	166
第三节	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	179
第四节	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全面发展	192
第五节	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206
第六章	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和挽救革命的斗争	217
第一节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各地人民的反蒋斗争	217

第二节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	224
第三节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230
党在北伐战争时期小结	237

附 图：

- 一、北伐前夕国内政治形势略图
(1926年6月)
- 二、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示意图
(1926年7月—1927年6月)

第一编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 早期革命活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 状况。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地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发动侵华战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夺取了许多政治经济特权，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商品销售场所和原料产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又先后通过侵华战争，在中国进一步掠夺和“租借”了大片领土，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取得了在中国驻扎侵略军，开设工厂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经理航运等特权，直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控制了中国的财

政和经济命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大权。这样，一个独立的
中国就逐渐地沦为受各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半殖民地。

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基础，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造成了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从而刺
激了中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侵入
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
把封建的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又极力
支持和庇护中国的封建势力，把中国的封建势力变成它们侵略和
统治中国的支柱，借以防止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阻挠和扼杀中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中国的封建社会
虽然遭到破坏，但中国社会却又长期停留在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在中国社
会中仍然长期地保持着，而且同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
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

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
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和各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便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这时在中国社会中，除了原有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及其
他小资产阶级之外，又产生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各阶级相互
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级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出
现了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使中国的经济不能发展，政治
不能进步，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自由，就成为中国人
民的根本要求。为了实现这种根本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两座大山，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
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斗争从未间断。其中太平

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一八五一年——一八六四年），前后坚持达十四年之久，沉重地打击和削弱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意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最终都失败了。历史证明了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要求，敢于用革命暴力摧毁敌人的反动统治，然而，他们终究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社会和革命的发展前途，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是，由于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他们既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又害怕工人和农民。他们不但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甚至没有勇气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人民长期的斗争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有一个新型的先进阶级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这个阶级就是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因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比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一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主要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因为在这些年代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在战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包

括官办的)计有工厂六百九十八个,资本三亿三千余万元,到一九一九年,工厂增至一千七百五十九个,资本五亿余元,六年时间,工厂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点七,资本增加百分之五十四点五^①。其中纺织、面粉、卷烟、造纸、制革等轻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例如棉纺织业,一九一三到一九二一年,全国华商纱厂的纱锭,由四十八万四千一百余锭增至一百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余锭,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点八;布机,由二千零一十六台增至五千八百二十五台,增长百分之一百八十八点九^②。再如面粉业,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共新建面粉厂四十七个,而且从一九一五年开始,中国连续数年成为面粉出超的国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国面粉的出超量由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担增加到三百四十四万九千七百五十八担,增加五十八倍以上^③。

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不仅企业的总数量增多了,而且大企业的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据当时北京军阀政府农商部的统计,一九一四年注册的工业企业,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大企业,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到一九二〇年则增至百分之十四^④。此外,在采矿、运输业方面,这时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例如,中国资本的新式煤矿的产量,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〇年,由四十四万九千五百吨增至四百八十八万九千七百吨,增长十倍多;中国轮船吨数,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由十三万三千二百余吨增至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余吨,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六^⑤。

① 参阅陈真、姚洛、逢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5—56页。

② 参阅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35页。

③ 同上,第39—40页。

④ 参阅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9页。

⑤ 同上,第109—110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稍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和美国利用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及医治战争创伤的机会，也极力扩张其在华的经济势力。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日本在华的商家，由一千二百六十九家增至四千二百七十八家，增长百分之二百三十七；在华商船航行吨位，由二千三百四十二万二千吨，增至二千八百一十九万二千吨，增长百分之十九^①。同期，日本的在华纱锭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二，对中国的公开借款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四，在我国东北的投资增加百分之三百六十七^②。日商在华经营的工厂，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三年共有一百五十四个，而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一年则增至二百二十二个^③。此外，日本还通过借款和在华的金融势力，控制了我国大批工矿企业。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经济势力迅速扩张，一跃而赶上了在华经济势力久居于各帝国主义首位的英国。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美国在华的商家，由一百三十一家增至四百零九家，在华商船航行吨位，由八十九万九千吨增至四百七十一万八千吨^④。美国对华的商品输出额，据我国海关统计，一九一五年为三千七百零四万三千海关两，一九二一年增至一亿七千五百七十八万九千海关两，增长百分之三百七十四以上^⑤。美国还通过在华银行和投资公司控制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这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虽然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日本，但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而跃居第三位。

① 参阅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1 页。

② 同上，第 110 页。

③ 参阅陈真、姚洛、逢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21 页。

④ 参阅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1 页。

⑤ 参阅：陈真、姚洛、逢先知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279 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方面，由于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互相厮杀，一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因而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华势力的猛烈扩张，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也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封建地主阶级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其反动统治愈加黑暗腐败。

一九二一年，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夺政权以后，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实现其登基称帝的野心而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不但公然承认日本侵占我国山东，而且无耻地接受日本蛮横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京政权落到日本的另一个走狗段祺瑞手中。段仍承袭袁的衣钵，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各种名义，先后向日本借款五亿日元以上。同时，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我国山东、东北和蒙古等地，并聘请日本军官训练中国军队，任其控制中国的军事机构。各省地方军阀，也都如法炮制，以帝国主义为后台，靠出卖国家主权维持其反动统治。

自袁世凯死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已陷于四分五裂，再也无法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这时，北洋军阀已分裂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依附英美帝国主义，占据着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依附日本帝国主义，占据着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等省。此外，还有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霸占着东北三省。全国其他各省，也都为各地方军阀所盘据。所谓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已是徒具虚名。

在这期间，各派军阀为扩大地盘，经常进行剧烈的争夺。从一九一二年起，中国军阀混战几乎连年不绝，甚至一年之内就发生

几次战争。军阀的卖国求荣和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无数灾难和痛苦，这就极大地加深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全国人民大众的对立。

其次，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下，处境更加悲惨，自发的反抗和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下，各派军阀不断扩充军队、补充军火，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如北京政府的军费开支（不包括地方军阀的军费），一九一六年为一亿五千二百九十多万元，一九一八年则增至二亿零三百万元^①。各派军阀为筹集战费并大发战争财，便不断增加田赋和捐税。据估计，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田赋猛增七倍，印花税增加六倍^②。此外，各地军阀还竞相巧立名目，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例如，当时河南就有杂捐三十八种，杂税五种；奉天有杂捐二十六种，杂税六种；福建有杂捐三十八种，杂税五种；贵州有杂捐二十六种，杂税六种。

在这期间，封建的土地集中的趋势也是很明显的。仅以当时的军阀官僚凭借权势掠夺土地来说，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今河南安阳、临漳、汤阴一带）等地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冯国璋在苏北占有土地七十万亩，段祺瑞在东北边境占有土地二十万顷，张作霖在东北占有土地一百五十万亩。其他地方军阀，如张敬尧、倪嗣冲、段芝贵、吴俊陞、汤玉麟等，也都各自占有土地数万亩。在大规模的土地集中的过程中，除了剥削阶级之间的“大鱼吃小鱼”的因素之外，严重的受害者则是广大农民群众。

在战争、赋税和土地掠夺的种种袭击之下，农民的苦难不堪言状，加以当时全国还有十几个省份连续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如黄

① 参阅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08页。

② 参阅《近代中国史稿》下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51页。

河两次决口，淮河、长江、永定河、辽河多次泛滥等，这就使得广大农民更加难以为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逃亡。

由于大量农民陷于破产和流离失所，以及战乱和天灾的影响，这时我国耕地面积也出现了缩减的趋势；与此相反，全国荒地面积在不断扩大。全国耕地面积以一九一四年为一百，一九一五年则为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一六年为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一七年为百分之八十六，一九一八年为百分之八十三^①。全国荒地面积，以一九一四年为一百，一九一五年则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三，一九一六年为百分之一百零九，一九一七年为百分之二百五十九，一九一八年为百分之二百三十七^②。耕地面积缩减和荒地面积扩大的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当时我国农业生产陷于严重萎缩的状态。

农民因处境日益恶化，便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仅据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时报》的不完全记载，当时的农民“骚动”计有：一九一五年十七次，一九一六年十六次，一九一七年二十二次，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十五次。其中参加人数有记载的四十四次，共有三十三万七千余人。“骚动”的范围遍及十几个省。这些斗争，最终虽然都失败了，但它却充分表明了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革命要求。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处境有所好转；但它的发展仍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阻挠。

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在轻工业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然而即使在这个方面，它也赶不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发展速度。如纱厂的纱锭，以一九一三年为一百，到一九一九年，中国仅为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点七，而日本和英国同期在华的纱锭则分别为百分

^{①②} 参阅李逸安：《中国耕地面积渐减的倾向》，见《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十八号，1933年9月16日。

之二百九十六和百分之一百七十七^①。中国的增长速度，不仅仅远远落后于日本，而且低于当时正忙于欧战的英国。至于中国的重工业，这时基本上仍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和控制。如一九二〇年，新式采煤的百分之七十六点八的产量为外资所控制；而铁的生产竟然百分之百地为外资所垄断^②。

其次，中国民族工商业仍然遭受封建主义的严重压榨。我国军阀的军费开支，其重要来源之一，就是课征工商税。当时外货进口，只要上百分之五的关税和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在我国各地运销无阻；而我国民族工业产品，一般却要上百分之二十左右的重税，才能在国内各地销售^③。仅此一项，已足以表明封建主义对民族工商业的严重打击。此外，军阀滥发公债和纸币，连年战祸所造成的政局不稳与交通梗阻等，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都是非常不利的。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断打击和阻挠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始终是十分明显的，甚至是很尖锐的。然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始终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往往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和勇气。此外，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的矛盾，这时也有所发展。

第四，我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觉悟程度，这时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家开始在中国开

① 参阅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② 参阅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27页。

③ 参阅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5页。